



运动世界的精神之光

□ 靳凤林

只要有学校的地方必然有与其配套的体育设施，因为体育与智力开发、德性培育、健美身体之间存在着辅车相依的内在关联。中央党校体育馆坐落于中央党校北校区的方舟湖畔，建成于2004年8月，是中央党校标志性建筑之一。体育馆的四周除了“闲云潭影日悠悠”的方舟湖外，还环绕着茂密的银杏、梧桐、圆柏、红枫、刺槐、白皮松、金枝国槐等众多树种，随着春夏秋冬四季更替，这里可谓是“四季皆有美景，样样可作画题”。在草长莺飞的春天，周边姹紫嫣红、百花芳菲；到了骄阳似火的夏季，这里又变得绿树成荫、鸟语蝉鸣；而在天高云淡的秋季，则是金风送爽、层林尽染；特别是在瑞雪纷飞的冬季，这里呈现出玉树银花、银装素裹、清绝肃雅的宁静画面，给人以天辽地阔的浩茫之感。

中央党校体育馆的外观造型简洁明快，自南向北似飞翼升起，通过共享大厅和皇冠形篮球馆结合在一起。屋顶造型是三个依次相连的拱形檐口，一层高过一层，象征着腾飞与向上，犹如大海波涛，汹涌澎湃。南侧是由连廊衔接的观光塔，塔高28米，恰似一面高高竖起、鼓荡飘扬的壮美风帆。观光塔和屋顶层层递进的拱形檐口连在一起，远远望去，给人以航行大海时“风帆千尺鲸波间”的乘风破浪之感。体育馆内建有乒乓球馆、网球场、多功能馆、壁球馆、体操馆、游泳馆、棋牌室等多个健身场馆，是深为广大学工人员喜爱的强身健

体之所。

乒乓球馆是学工人员利用度较高的场馆之一，作为“国球”的乒乓球是一种高速度、高对抗的隔网比赛项目，对很多人都大有吸引力，人们在这里参加单打、双打项目的锻炼，在推挡、削球、扣球、旋转球、弧圈球等各种技术变换中，频繁变线、声东击西，实现体能、技能、智能水平的综合提高。网球场内则是球员们在快速奔跑中击球、扣球的身影，人们在挥拍、转腰、移动中，实现颈部、肩部、胸部、背部、腿部的综合运动，从中摆脱疲劳、困扰、压抑和束缚，实现身心的自由和活力的释放。在上述各个场馆中，我所最爱的当属游泳馆，游泳是我30多年来从未间断的体育爱好。我认为游泳是一种较为完善的全身性锻炼方式，无论是蛙泳、仰泳，还是自由泳、蝶泳，只要勤学苦练、持之以恒，最终都会收获轻松、自然、流畅的健身愉悦之感。

很多人只是把体育锻炼视作强身健体的方式之一，但实际上人类各种体育运动还包含着更为深层的人生哲学意涵。就个人而言，它关涉一个人自主与自律的辩证统一。卢梭说，“人是生而自由的，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”。而体育运动则是人们自主选择的游戏行为，人们可以自主设置游戏的地点和时间，商议和制定各种游戏规则，平等地参与各类竞技比赛，还可以通过神圣的仪式赋予其特别的意义。与此同时，体育活动对人的自律性

提出了很高的要求，因为长期从事一项运动，必须具备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，高度热爱和享受运动，不能随一时之兴浅尝辄止。在运动过程中，又要学会严格遵守游戏规则，特别是在多人参与的竞技游戏中，还必须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。只有做到了自主与自律的高度统一，才能在尽情展现自我的同时，展示人性的光辉，获得潜能涌

类精神。《奥林匹克宪章》赋予奥林匹克精神的内容是：“相互理解、友谊长久、团结一致和公平竞争”，这种精神今天已经成为全人类的一种共同愿望和共同期待。与此宗旨相适应，国际奥委会将奥林匹克格言定为“更快、更高、更强——更团结”。德国美学家席勒把奥林匹克竞赛比作展现人的力量、速度和灵巧的比赛，而且是更高尚



中央党校体育馆

现时的成就感和体验感。

就国家而言，体育运动还蕴含着激励一个民族或国家拼搏进取的奋斗精神。早在1917年，毛泽东面对国家羸弱和人民病痛的局面，就喊出了“欲文明其精神，先野蛮其体魄”的时代强音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他又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题词“发展体育运动，增强人民体质”，这句话也由此成为新中国体育发展的指导方针。时至今日，我国广大体育工作者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“为国争光、无私奉献、科学求实、遵纪守法、团结协作、顽强拼搏”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体育精神。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，我国一代又一代体育健儿为了祖国荣誉，追求卓越、突破自我，用豪情挥洒梦想，靠拼搏写下荣光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、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的那样，我国运动员“用辛勤付出、坚强毅力、巨大勇气，以强烈的责任感、使命感、荣誉感，出色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，创造了无愧于祖国、无愧于人民、无愧于时代的光辉业绩！”

就世界而言，体育运动闪烁着以奥林匹克精神为代表的伟大的人

的智力竞赛。在他看来，只有当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时，他才进行体育竞赛这种高级游戏；而只有当人在进行体育竞赛的游戏时，他才是真正完整意义上的人。而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，在尊重对手、尊重裁判、尊重观众、遵守规则中，战胜自我、超越自我，胜不骄、败不馁，以良好的赛风赛纪和文明礼仪充分展示中国的良好形象，则构成了历届中国体育健儿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最好诠释。

在中央党校体育馆的门前矗立着著名雕塑家曾成钢的一尊作品《圣火接力》，它用虚实结合的对比和极具动感的形象，使两个跃动的身姿尽显张力，高度凝聚了运动员接力火种时的刹那动势，充分展现出奥林匹克运动所代表的丰富精神内涵，这尊雕塑时刻都在提示着来这里运动的每位党校教工和学员，向着“更快、更高、更强——更团结”迈进！



劳动，童年的田园牧歌

□ 施崇伟

以劳动命名的节日是五月伊始。五月，与春耕有关。在我老家重庆南部的乡村里，五月田园的场景，就是那妩媚阳光下的一汪水田，牛是画面的主角，奋蹄扬起的“哗哗”水声是牧歌的序曲。

五月与春耕，两个话题一交集，便把我拉回到五十年前的影像中。我的童年，是放牛娃的童年，那些劳动的岁月，瞬间浮现在眼前。

茅屋和牛是我这个年龄的农村小孩提时最重要的记忆。放牛、喂牛，差不多是每个乡村儿童的生活经历。长大后即便成了城里人，每个人也都有一部牛娃回忆录。

我刚出生的时候身体弱小，母亲用牛奶喂养了我；我的第一次“远行”是坐在牛背上游览村头的大田；我的第一份收入是背牛草换来的母亲的“奖赏”；我考上县中学的代价是父亲含泪卖了老牛……

最难忘啊，我的牛娃童年。放牛、喂牛是极富乐趣的。不仅有一个庞然大物任由摆弄，还能一边放牛一边恣意地晒着青草味的阳光，自由呼吸花果弥漫的空气。放牛时经常会有意外收获。比如，夏天，青青河边草地，坡上可以挖洞里的螃蟹，下河能抓小鱼；比如，秋天，放任牛在橘树林下吃草，小孩们便能“顺手牵羊”几个果子，哪怕还酸涩着，在孩子的味道里都是甜的……

割牛草是要贯穿年头到年尾的。它是件劳累活，也是个趣味活，还是个技术活。要领有二：磨刀、早起。

“磨刀不误砍柴工”，磨刀也不误割草活儿。上拔割草前，得先把刀磨快。磨刀要在头天晚上完成。月光映着已被磨成月牙状的磨刀石，一屁股坐下，往磨石上浇一点水，拿起割草刀，手上用劲伴着“嗡嗡”响起的节奏，在磨石上来来回回。看着刀刃渐渐亮起来，用手指肚刮刮刀刃，或者用草叶在刀刃上“走一走”，能达到“吹叶可断”的程度，就算大功告成了。别看还没有牛背高的放牛娃们，干起这活来各个得心应手。

“早起的鸟儿有虫吃”，早起的放牛娃有草割。要想早一点蓄积充足的牛粮草，比的是谁起得早。早起，就能获得就近的草资源，起晚了，近的山坡草就被割光了，只有往远处去找。有的时候，要到几里外的大山里才能找到。起早还有一个好处，晨间的草很鲜嫩，挂着露珠，湿漉漉的，牛儿爱吃，能更快地把牛养壮。

起早了也不能在山坡上信马由缰瞎逛，得先“占地盘”，占到地盘心不慌。发现一片茂盛的青绿后，得马上在草地上割出一圈“外围”，算是划归自己的领地。这个时候，才可以稍稍歇口气，迟来的牛娃都懂先来后到的规矩，见草地被圈起了，便赶着牛另寻割草的去处了。

最为喜悦和惬意的时刻，是傍晚来

临，吹响树叶卷成的“乐器”，看着牛儿撒欢迈蹄向自己奔来。看着天边的彩霞落在牛背上，晚风里掠过归巢的燕影……牛吃得饱饱的，摸一摸它的角、抡一抡它的尾、骑上它的背归来，一群快乐的孩子像凯旋的士兵，那种成就感无法言喻、其乐无穷。

牧童时光已渐行渐远，如今年近花甲的我，回忆起人生的过往，发现那段岁月带给我太多的感悟，让我在享受劳动快乐的同时，养成劳动和勤俭的习惯，使我更加热爱生活、不惧人生路上的艰难和考验，可谓终身受益！童年时代养育我的田园牧歌，像老牛反刍一般让我回味在劳动的节日里。



曾巩家族的清正之风

□ 徐伟鹏

修身廉洁自律

曾巩家族重视廉洁自律。据《南丰县志》记载，曾巩祖父曾致尧（后追封密国公）曾在越州监管酒税，一次告假回乡时，“母周氏置酒园中，族戚咸集。或消密衣冠冠蔽垢，仆马羸瘦者。母曰：‘贫而见我，是我荣也。若黻货而归，贻吾忧矣。’”由此可见，曾致尧为官清廉离不开其母的教诲和支持。

曾巩认为，“正己而治人，故谓之政。政者，岂止于治文书、督赋敛、断狱讼而已乎”，为政者必须修身廉洁自律，做到“则万物之自外至者，安能累我哉？此君子之所以虚心也，万物不能累我矣”，才能起到以身作则，“正己”而后“正人”的作用。曾巩出任福州知州时，当地有很多寺庙，庙产富饶，寺僧也无须承担税赋劳役，因此许多百姓乐于通过贿赂官吏附籍于寺，而僧人更是公然“赋请公行”，希望曾巩能予其扶持之位。这种以向主官行贿而谋得私利之事在当地由来已久，并已成新风习，但曾巩却坚持“授帖于府庭，却其私谢，以绝左右微求之弊”。他拒绝贿赂，坚持

用择人以贤的清正之风，涤荡私相贿赂的污浊之气，使福州官场“阖府微赂，至衰钱数千”的陈腐习气得到改观。

父亲去世后，曾巩实际上在兄弟间承担起了父亲和老师责任。《宋史·曾布传》中就有曾布“年十三而孤，学于兄巩”的记载，而曾肇更是直接认为他与曾巩之间“属则昆弟，恩犹父师”。当弟弟们出仕一方后，曾巩还是时时关心，教诲他们修身廉洁自律的为官做人之道。诗作《寄舍弟》《与舍弟别舟岸间相望感叹成咏》《喜二弟侍亲将至》等都反映了他对弟弟们的殷殷关切。有时他还在诗后附言肯定弟弟所获之成绩，鼓励他们坚守祖训，廉洁修身，造福百姓。

为政心怀百姓

有宋一代，曾家出仕为官者甚众。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，曾巩及三弟曾牟、五弟曾布、堂弟曾阜和两个妹夫王无咎、王幾全部考中科举，创下了一门高中六进士的佳话。嘉祐六年（1061年）和治平四年（1067年），四弟曾宰和六弟曾肇又接连一举登第。

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是江西南丰人。曾巩生于北宋天禧三年（1019年），卒于元丰六年（1083年），其家族南丰曾氏是宋代政坛中比较显赫的公卿之家，家族中出仕者众多。除了素有“南丰三曾”之称的曾巩、曾布、曾肇之外，还有多人任宦。曾家家风以清正闻名，宋代以后，虽然出仕人数减少，盛况不复当年，但家风丝毫未堕，一门忠厚，满庭芬芳。

崇尚诗书礼义

早从唐代开始，曾巩的先祖曾洪、曾延铎便已入朝为官。曾家迁居南丰后，曾巩的祖父曾致尧一度官居两浙转运使，父亲曾易占曾任太常博士。熟习诗书礼义，报效朝廷是曾氏一贯的家学传统。曾巩在《上欧阳学士第一书》中便自陈道：“巩性朴陋，无所能似，家世为儒，故不业他。”

曾家人酷爱藏书、读书。曾肇在《子固先生行状》中称哥哥曾巩“平生无所玩好，顾喜藏书，至二万卷，仕四方，常与之俱，手自雠对，至老不倦”。这些书囊括了“六艺百家史氏之籍，笺疏之书，与夫论美刺非、感微托远、山镜冢刻、浮夸诡异之文章，下至兵权、历法、星官、乐工”等方面，可谓无所不包。曾巩也在《亡弟湘潭县主簿子翊墓志铭》中回忆四弟曾宰：“少力学，六艺百子、史氏记、钟律地理、传记笺疏、史篇文字，目览口诵手抄，日常数千言，手抄书连箱累笥不能容。”而据

王安石所撰《河东县太君曾氏墓志铭》记载，曾巩的姑姑虽为女子，却也同样酷爱读书，以至“于财无所蓄，于物无所玩，自司马氏以下，史所记世治乱、人贤不肖，无所不读”。可见其家中诗书风气之浓厚。到曾肇的儿子曾统时，甚至朝廷修纂国史都要倚仗其力量。《京口耆旧传》中记载道：“统，文献故家，藏书素多。绍兴间，重修国史，诸老论谢，无所订正。成书不谬，足以传传统之力为多。”

南丰曾氏是“宗圣”曾参之后，为学最重忠恕礼义。为官之前，曾巩在家中苦读深思时，便有“养吾心以忠，约守而恕行之，其过也改，趋之以勇，而至之以不止，此吾之所以求于内者”之志。后来，他的文章得到北宋文坛大家欧阳修的认可，得以拜入门下，随时请教先贤学问。他在《上欧阳学士第二书》中记述道：“坐而与之言，未尝不以前古圣人之至德要道，可行于当今之世者，使巩薰蒸渐渍，忽不自知其益，而及于中庸之门户，受赐甚大，且感且喜。”能够跟随当世大家学习诗书礼义之道，使得曾巩的学问日日精进，终于有所成就。



行乡里，残害良民，且势力之大以至于“州县吏莫敢诘”。曾巩不仅立刻将其“取置于法”，而且开始在全州域内大力整饬治安、铲除恶霸、缉捕嫌犯，建乡民安保制，安定百姓生活。据《宋史》记载，经过曾巩治理，齐州“自是外户不闭”，可见治理改善之大。后来曾巩在任职江西时恰逢瘟疫暴发，他不仅妥善处理了疫情，而且坚持以生民为本，使“军民不能自养者，来食息官舍，资其食饮衣衾之具，分医视诊”，使无数百姓免于病患、无数人家免于离散。他每次离任时当地百姓都万般不舍，后人更是相继为他修建了“曾公祠”“南丰祠”，祭祀不断。

曾氏家风不仅闻名于宋代，而且久为后世敬仰。《曾坊曾氏支谱》中收录的曾肇《谱序》记载道：“盖自吾祖考仕皆不称其才，泽不加于天下，然教行于家者六艺之学，孝友之行，廉耻之操，忠信直谅之守，少而习于耳目，长而成于身心，虽不肖者不敢不勉也。”曾家子孙正是在长辈规训之下代代相传，才逐渐形成了令人敬仰的君子之家。明代学者宋谦在《曾学士文集序》中赞叹说：“至于文定公巩、文肃公布、文昭公肇起于南丰……不可以一二数。呜呼！何南丰曾氏之多贤哉！”